

無 兵 的 文 化

雷 海 宗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第 一 卷 第 四 期 單 行 本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七 月)

無兵的文化

雷海宗

- (一) 政治制度之凝結
- (二) 中央與地方
- (三) 文官與武官
- (四) 士大夫與流氓
- (五) 朝代交替
- (六) 人口與治亂
- (七) 中國與外族

著者前撰中國的兵，友人方面都說三國以下所講的未免太簡，似乎有補充的必要。這種批評著者個人也認為恰當。但二千年來兵的本質的確沒有變化。若論漢以後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續通考中也有系統的敘述，作一篇洋洋大文並非難事。但這樣勉強敘述一個空洞的格架去湊篇幅，殊覺無聊。反之，若從側面研究，推敲二千年來的歷史有甚麼特徵，卻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探求。

秦以上為自主自動的歷史，人民能當兵，肯當兵，對國家負責任。秦以下人民不能當兵，不肯當兵，對國家不負責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環境（如氣候，饑荒等等）與人事環境（如人口多少，人才有無，與外族強弱等等）的支配。

秦以上為動的歷史，歷代有政治社會的演化更革。秦以下為靜的歷史，只有治亂騷動，沒有本質的變化。在固定的環境之下，輪迴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的更迭排演，演來演去總是

同一齣戲，大致可說是漢史的循環發展。

這樣一個完全消極的文化，主要的特徵就是沒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說沒有國民，也就是說沒有政治生活。爲簡單起見，我們可以稱它爲“無兵的文化。”無兵的文化，輪迴起伏，有一定的法則，可分幾方面討論。

一 政治制度之凝結

歷代的政治制度雖似不同，實際只是名義上的差別。官制不過是漢代的官制，由一朝初盛到一朝衰敗期間官制上所發生的變化也不能脫離漢代變化的公例。每朝盛期都有定制，宰相的權位尤其重要，是發揮皇權的合理工具，甚至可以限制皇帝的行動。但到末世，正制往往名存實亡，正官失權，天子的近臣如宦官，外戚，幸臣，小吏之類弄權專政，宰相反成虛設。專制的皇帝很自然的不願信任重臣，因爲他們是有相當資格的人，時常有自己的主張，不見得完全聽命。近臣地位卑賤，任聽皇帝吩咐，所以獨尊的天子也情願委命寄權，到最後甚至皇帝也無形中成了他們的傀儡。

例如漢初高帝，惠帝，呂后，文帝，景帝時代的丞相多爲功臣，皇帝對他們也不得不敬重。他們的地位鞏固，不輕易被撤換。蕭何在相位十四年，張蒼十五年，陳平十二年，這都是後代少見的例。蕭何，曹參，陳平，灌嬰，申屠嘉五個丞相都死在任上，若不然年限或者更長。(1)

丞相在自己權限範圍以內的行動，連皇帝也不能過度干涉。例如申屠嘉爲相，一日入朝，文帝的幸臣鄧通在皇帝前恃

(1) 俱見漢書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

寵怠慢無禮。丞相大不滿意，向皇帝發牢騷：

“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文帝只得抱歉的答覆：“君勿言，吾私之。”但申屠嘉不肯放鬆，罷朝之後回相府，正式下檄召鄧通，並聲明若不即刻報到就必斬首。鄧通大恐，跑到皇帝前求援。文帝叫他只管前去，待危急時必設法救應。鄧通到相府，免冠赤足頓首向申屠嘉謝罪，嘉端坐自如，不肯回禮，並聲色俱厲的申斥一頓：

“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

“大不敬”在漢律中是嚴重的罪名，眼看就要斬首。鄧通頓首不已，滿頭出血，申屠嘉仍不肯寬恕。文帝計算丞相的脾氣已經發作到滿意的程度，於是遣使持節召鄧通，並附帶向丞相求情：“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回去見皇帝，一邊哭，一邊訴苦：“丞相幾殺臣！”(2)

這幕活現的趣劇十足的表明漢初丞相的威風，在他們行使職權的時候連皇帝也不能干涉，只得向他們求情。後來這種情形漸漸變化。武帝時的丞相已不是功臣，因為功臣已經死盡。丞相在位長久或死在任上的很少，同時有罪自殺或被戮的也很多。例如李蔡，莊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都不得善終。(3) 並且武帝對丞相不肯信任，相權無形減少。丞相府原有客館，是丞相收養人才的館舍。武帝的丞相權小，不能多薦

(2) 漢書卷四二申屠嘉傳。

(3) 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傳，卷六六公孫賀傳，劉屈氂傳。

人，客館荒涼，無人修理；最後只得廢物利用，將客館改爲馬廄，車庫，或奴婢室！⁽⁴⁾

武帝似乎故意用平庸的人爲相，以便於削奪相權。例如田千秋本是關中高帝廟的衛寢郎，無德無才，只因代衛太子訴冤，武帝感悟，於是就拜千秋爲大鴻臚，數月之間拜相封侯。一言而取相位，這是連小說家都不敢輕易創造的奇聞。這件事不幸又傳出去，遺笑外國。漢派使臣聘問匈奴，單于似乎明知故問：

“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

使臣不善辭令，把實話說出，單于譏笑說：

“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

這個使臣忠厚老實，回來把這話又告訴武帝。武帝大怒，認爲使臣有辱君命，要把他下吏治罪。後來一想不妥當，恐怕又要遺笑大方，只得寬釋不問。⁽⁵⁾

丞相的權勢降低，下行上奏的文件武帝多託給中書謁者令。這是皇帝左右的私人，並且是宦官。這種小人“領尙書事，”丞相反倒無事可作。武帝晚年，衛太子因巫蠱之禍自殺，昭帝立爲太子，年方八歲，武帝非託孤不可。於是就以外戚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受遺詔輔政。⁽⁶⁾大司馬大將軍是天下最高的武職，領尙書事就等於“行丞相事，”是天下最高的政權。武帝一生要削減相權，到晚年有意無意間反把相權與軍權一併交給外戚。從此西漢的政治永未再上軌道。皇

(4) 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傳。

(5) 漢書卷六六車千秋傳。

(6) 漢書卷六武帝紀，卷六八霍光傳。

帝要奪外戚的權柄就不得不引用宦官或幸臣,最後仍歸失敗,漢的天下終被外戚的王莽所篡。至於昭帝以下的丞相,永久無聲無臭,大半都是老儒生,最多不過是皇帝備顧問的師友,並且往往成爲貴戚的傀儡。光武中興,雖以恢復舊制相標榜,但丞相舊的地位永未恢復,章帝以後的天下又成了外戚宦官交互把持的局面。

後代官制的變化,與漢代如出一轍。例如唐朝初期三省的制度十分完善。尚書省總理六部行政事宜,尚書令或尚書僕射爲正宰相。門下侍中可稱爲副宰相,審查詔敕,並得封駁奏鈔詔敕。中書令宣奉詔敕,也可說是副宰相。但高宗以下天子左右的私人漸漸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名義奪取三省的正權,這與漢代的“領尚書事”完全相同。(7)

唐以後壽命較長的朝代也有同樣的發展。宋代的制度屢次改革,但總的趨勢也與漢唐一樣。南渡以後,時常有臨時派遣的御營使或國用使一類的名目,操持宰相的實權。明初有中書省,爲宰相職。明太祖生性猜忌,不久就廢宰相,以殿閣學士勉強承乏。明朝可說是始終沒有宰相,所以宦官纔能長期把持政治。明代的演化也與前代相同,不過健全的宰相當權時代未免太短而已。滿清以外族入主中國,制度和辦法都與傳統的中國不全相同,晚期又與西洋接觸,不得不稍微摹倣改制。所以清制與歷來的通例不甚相合。

歷朝治世與亂世的制度不同,丞相的權位每有轉移。其間時常發生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前代末期的亂制往往被後代承認爲正制。例如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乃是漢末魏晉南北

(7) 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一,卷四七百官志二。

朝亂世的變態制度；但唐代就正式定它爲常制。樞密院本是唐末與五代的反常制度，宋朝也定它爲正制。但這一切都不過是名義。我們研究歷代的官制，不要被名稱所誤。兩代可用同樣的名稱，但性質可以完全不同。每代有合乎憲法的正制，有小人用事的亂制。各朝的正制有公同點，亂制也有公同點；名稱如何，卻是末節。盛唐的三省等於漢初的丞相，與漢末以下演化出來的三省全不相同。以此類推，研究官制史的時候就不至被空洞的官名所迷惑了。

二 中央與地方

宰相權位的變化，二千年間循環反覆，總演不出新的花樣。變化的原動力是皇帝與皇帝左右的私人，與天下的人民全不相干。這在一個消極的社會是當然的事。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秦漢以下也有類似的定例。太平時代中央政府大權在握，正如秦漢的盛世一樣。古代封建制度下的階級到漢代早已消滅。階級政治過去後，按理可以有民衆政治出現；但實際自古至今在任何地方也沒有發生過真正的全民政治，並且在階級消滅後總是產生個人獨裁的皇帝政治。沒有階級的社會，無論在理論上如何美善，實際上總是一盤散沙。個人、家族，以及地方的離心力非常強大，時時刻刻有使天下瓦解的危險。社會中並沒有一個健全的向心力，只有專制的皇帝算是勉強沙粒結合的一個不很自然的勢力。地方官必須由皇帝委任，向皇帝負責；不然天下就要分裂混亂。並且二千年來的趨勢是中央集權的程度日愈加深。例如漢代地方官只有太守是直接由皇帝任命，曹掾以下都由太守隨

意選用本郡的人。南北朝時，漸起變化。隋就正式規定大小地方官都受命於朝廷，地方官迴避鄉土的制度無形成立。(8) 若把這種變化整個認為是由於皇帝或吏部願意攬權，未免因果倒置。主要的關係恐怕還是因為一般的人公益心日衰，自私心日盛，在本鄉作官弊多利少，反不如外鄉人還能比較公平客觀。所以與其說皇帝願意絕對集權，不如說他不得不絕對集權。

亂世的情形正正相反。帝權失墜，個人、家族與地方由於自然的離心力又恢復了本質的散沙狀態。各地豪族、土官、流氓、土匪的無理的專制代替了皇帝一人比較合理的專制。漢末三國時代與安史亂後的唐朝和五代十國都是這種地方官專擅的好例；最多只維持一個一統的名義，往往名義上也為割據。例如唐的藩鎮擅自署吏，賦稅不解中央，土地私相授受，甚至傳與子孫。(9) 這並不是例外，以前或以後的亂世也無不如此。在這種割據時代人民受的痛苦，由民間歷來喜歡傳誦的“寧作太平犬，勿作亂世民”的話，可以想見。亂世的人無不希望真龍天子出現，因為與地方小朝廷的地獄比較起來，受命王天下的政治真是天堂。

宋以下好似不大見到割據的局面，但這只是意外原因所造出的表面異態。北宋未及內部大亂，中原就被外族征服。南宋也沒有得機會形成內部割據，就被蒙古人吞併。這都是外來的勢力使中國內部不得割據的例證。元末漢人驅逐外族，天下大亂，臨時又割據起來。明末流寇四起，眼看割據的局面就要成立，恰巧滿清入關，中國又沒有得內部自由搗亂。清

(8) 顧炎武 日知錄 卷八 掾屬。

(9) 新唐書 卷五〇 兵志，卷二一〇 藩鎮列傳。

末民初割據的局面實際已經成立,只因在外族勢力的一方面威脅一方面維持之下中國不得不勉強擺出一個統一的面目,所以在北京政府命令不出國門的時候,中國名義上仍是一個大一統的中華民國。最近雖略有進步,這種情形仍未完全過去。所以宋以下歷史的趨勢與從前並無分別;只因外族勢力太大,內在的趨勢不得自由活動而已。

三 文官與武官

文官武官的相互消長也與治亂有直接的關係。盛世的文官重於武官,同品的文武二員,文員的地位總是高些。例如漢初中央三公中的丞相高於太尉,地方的郡守高於郡尉,全國的大權一般講來也都操在文吏的手中。(10) 又如唐初處宰相地位的三省長官全為文吏,軍權最高的兵部附屬於尚書省,唐制中連一個與漢代太尉相等的武官也沒有。(11)

獨裁的政治必以武力為最後的基礎。盛世是皇帝一人的武力專政,最高的軍權操於一手,皇帝的實力超過任何人可能調動的武力。換句話說,皇帝是大軍閥,實力雄厚,各地的小軍閥不敢不從命。但武力雖是最後的條件,直接治國卻非用文官不可;文官若要合法的行政,必須不受皇帝以外任何其他強力的干涉支配;若要不受干涉,必須有大強力的皇帝作後盾。所以治世文勝於武,只是一般的講;歸結到最後,仍是強力操持一切。這個道理很明顯,歷史上的事實也很清楚,無需多贅。中國歷史上最足以點破這個道理的就是宋太祖杯酒解兵權

(10) 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11) 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一,卷四七百官志二。

的故事：——

“乾德初，帝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我非爾曹不及此，然吾爲天子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

“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爲出此言邪？’

“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

“守信等謝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

“帝曰：‘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

“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賚甚厚。”⁽¹²⁾

宋初經過唐末五代的長期大亂之後，求治的心甚盛，所以杯酒之間大軍閥能把小軍閥的勢力消滅。此前與此後的開國皇帝沒有這樣便宜，他們都須用殘忍的誅戮手段或在戰場上達到他們的目的。

亂世中央的大武力消滅，離心力必然產生許多各地的小武力。中央的軍隊衰弱，甚至消滅，有力的都是各地軍閥的私軍。這些軍閥往往有法律的地位，如東漢末的州牧都是朝廷的命官，但實際卻是獨立的軍閥。⁽¹³⁾ 唐代的藩鎮也是如此。此時地方的文官仍然存在，但都成爲各地軍閥的傀儡，正如盛

(12) 宋史卷二五〇石守信傳。

(13) 後漢書卷一〇四袁紹傳。

世的文官都爲大軍閥(皇帝)的工具一樣。名義上文官或仍與武官並列,甚或高於武官;但實情則另爲一事。例如民國初年各省有省長有督軍,名義上省長高於督軍;但省長的傀儡地位在當時是公開的秘密。並且省長常由督軍兼任,更見得省長的不值錢了。

亂世軍閥的來源,古今也有公例。最初的軍閥本多是中央的巡察使,代中央監察地方官,本人並非地方官。漢的刺史州牧當初是巡閱使,並非行政官。(14) 唐代節度使的前身有各種的監察使,也與漢的刺史一樣。後來設節度使,兵權雖然提高,對地方官仍是處在巡閱的地位;只因兵權在握,纔無形中變成地方官的上司。(15) 這種局面一經成立,各地的強豪,土匪,以及外族都可乘火打劫而成軍閥。如漢末山賊張燕橫行河北諸郡,朝廷不能討,封爲平難中郎將,領河北諸山谷事,每年並得舉孝廉。(16) 唐末天下大亂,沙陀乘機發展,以致引起後日五代時期的沙陀全盛局面。(17) 這些新軍閥都是巡察官的軍閥制度成立後方才出現的。

四 士大夫與流氓

在一盤散沙的社會狀態下,比較有組織的團體,無論組織如何微弱或人數如何稀少,都可操縱一般消極頹廢的墮民。中國社會自漢以下只有兩種比較強大的組織,就是士大夫與

(14) 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15) 新唐書卷五〇兵志,卷二一〇藩鎮列傳。

(16) 後漢書卷一〇一朱儆傳。

(17) 新唐書卷二一八沙陀傳。

流氓。

士大夫團體的萌芽，遠在戰國時代。古代的貴族政治破裂，封建的貴族被推翻，在政治上活動的新興人物就是智識份子，在當時稱爲遊說之士。但在戰國時代百家爭鳴，遊說之士並非一個純一而有意識的團體。這種團體的實現是漢武帝廢百家，崇儒術，五經成爲作官捷徑後的事。隋唐以下，更加固定的科舉制度成立，愈發增厚士大夫的團結力量。儒人讀同樣的書，有同樣的目標，對事有同樣的態度。並且因爲政治由他們包辦，在社會上他們又多是大地主，所以他們也可說有共同的利益。雖無正式的組織，他們實際等於一個政黨，並且是惟一的政黨。由此點看，一黨專政在中國倒算不得稀奇！皇帝利用儒人維持自己的勢力，儒人也依靠皇帝維持他們的利益。這些士大夫雖不是一個世襲的貴族階級，卻是惟一有共同目標的團體，所以人數雖少，也能操縱天下的大局。

但士大夫有他們特殊的弱點。以每個份子而論，他們都是些文弱的書生，兵戎之事全不了解，絕對不肯當兵。太平盛世他們可靠皇帝與團體間無形的組織維持自己的勢力。天下一亂，他們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權就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並無應付變局的能力。每次天下大亂時士大夫無能爲的情形就暴露無遺。亂世士大夫的行爲幾乎都是誤國禍國的行爲，古今絕少例外。他們的行爲不外三種。第一，是無謂的結黨誤國。東漢末的黨禍，宋代的新舊黨爭，明末的結黨，是三個最明顯的例。三例都是在嚴重的內憂或外患之下的結黨營私行爲。起初的動機無論是否純粹，到後來都成爲意氣與權力的競爭；大家都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

自己的意見與顏面，當然更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利。各黨各派所談的都是些主觀上並不誠懇客觀上不切實際的高調。(18)

亂世士大夫的第二種行爲就是清談。一般的高調當然都可說是清談，但典型的例卻是魏晉時代的清靜無爲主義。胡人已經把涼州，并州，幽州（略等於今日甘肅，山西，河北三省）大部殖民化，(19)中國的內政與民生也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一些負政治責任的人與很多在野的人仍在談玄，這可說是一種逃避現實的行爲。(20) 今日弄世喪志的小品幽默文字，與一知半解的鈔襲西洋各國的種種主義與盲目的號呼宣傳，可說是兩種不同的二十世紀式的清談。

亂世士大夫的第三種行爲就是作漢奸。作漢奸固然不必需要士大夫，但第一等的漢奸卻只有士大夫纔有資格去作，劉豫與張邦昌都是進士出身。洪承疇也是進士。

流氓團體與士大夫同時產生。戰國時代除遊說之士外，還有遊俠之士。他們都肯爲知己的人捨身賣命，多爲無賴遊民出身；到漢代皇帝制度成立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把俠士太公開的自由行動大致剷除。(21) 但這種風氣始終沒有消滅，每逢亂世必定抬頭。由東漢時起，流民也有了組織，就是宗教集團。最早的例就是黃巾賊。(22) 鬆散的人民除對家族外，很少有團結的能力。只有利用宗教的迷信與神秘的儀式纔能

(18) 除正史外，可參考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五，卷二六，卷三五。

(19) 晉書卷五六江統傳，卷九七匈奴傳。

(20)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八。

(21) 漢書卷九二游俠列傳。

(22) 後漢書卷一〇一皇甫嵩傳。

使民衆團結。由東漢時代起，歷代末世都有類似黃巾賊的團體出現。黃巾賊的宣傳，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似通不通的神秘口號。唐末黃巢之亂，也倡出黃應代唐的妖言。(23) 元末白蓮教盛行一時，(24) 明代(尤其明末)歷批的流寇仍多假借白蓮教或其他邪教的名義。(25) 滿清末季的白蓮教，天理教，八卦教(26)以及義和團都是這類的流氓，愚民，與餓民的團體。流氓是基本份子，少數愚民被利用，最後餓民大批入教。一直到今日，在報紙上還是時常發現光怪陸離的邪教在各地活動。但二千年來的流氓秘密組織是否有一線相傳的歷史，或只是每逢亂世重新產生的現象，已無從稽考了。

太平時代，流氓無論有組織與否，都沒有多大的勢力。但惟一能與士大夫相抗的卻只有這種流氓團體。梁山泊式劫富濟貧代天行道的綠林好漢，雖大半是宣傳與理想，但多少有點事實的根據。強盜竊賊，扒手，賭棍，以及各種各類走江湖的幫團的敲詐或侵略的主要對象就是士大夫。流氓的經濟勢力在平時並不甚強，但患難相助的精神在他們中間反較士大夫間發達，無形中增加不少的勢力。

流氓團體也有它的弱點。內中的份子幾乎都是毫無知識的人，難成大事。形式上的組織雖較士大夫為強，然而實際也甚鬆散，水滸中的義氣只是理想化的浪漫故事。真正大規模的堅強組織向來未曾實現過，所以在太平時代流氓不能與

(23) 新唐書卷二二五下黃巢傳贊。

(24) 明史卷一二二韓林兒傳。

(25)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六明代先後流賊。

(26) 魏源聖武記卷一〇。

士大夫嚴重對抗，並且往往爲士大夫所利用；大則爲國家的武官或捕快，小則爲士大夫個人的保鏢。由流氓團體的立場來看，這是同類相殘的舉動；可說是士大夫“以夷制夷”政策成功的表現。

但遇到亂世，士大夫所依靠的皇帝與組織失去效用，流氓集團就可臨時得勢。天下大亂，大則各地割據的土皇帝一部爲流氓頭目出身，小則土匪徧地，官憲束手，各地人民以及士大夫都要受流氓地痞的威脅與侵凌。人民除正式爲官廷納稅外，還須法外的與土匪納保險費，否則身家財產都難保障。士大夫爲自保起見，往往被迫加入流氓集團，爲匪徒奔走，正如太平時代士大夫的利用流氓一樣。以上種種的情形，對二十世紀的中國人都是身經，目睹，或耳聞的實情，無需舉例。

流氓雖然愚昧，但有時也有意外的成就。流氓多無知，流氓集團不能成大事；但一二流氓的頭目因老於世故，知人善任，於大亂時期或能成大領袖，甚至創造帝業。漢高祖與明太祖是歷史上有名的這類成功人物。但這到底是例外，並且他們成事最少一部份須靠士大夫的幫助，成事之後更必須靠士大夫的力量保守成業，天下的權力於是無形中又由流氓移到士大夫的手裏。

五 朝代交替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誰都知道這是三國志演義的開場白，也可說是二千年來中國歷史一針見血的口訣。一治一亂之間，並沒有政治社會上真正的變化，只有易姓王天下的角色更換。我們在以上各節所講的都是治世與

亂世政治社會上各種不同的形態,但沒有提到爲何會有這種循環不已的單調戲劇。朝代交替的原因或者很複雜,但主要的大概不外三種,就是皇族的頹廢,人口的增漲,與外族的遷徙。

第一種是個人的因素,恐怕不很重要;但因傳統的史籍上多偏重這一點,我們不妨略爲談及。皇族的頹廢化是一個自然的趨勢,有兩方面:一是生物學的或血統的,一是社會學的或習慣的。任何世襲的階級,無論人數多少,早晚總要遇到一個無從飛渡的難關,就是血統上的退化。從古至今沒有一個貴族階級能維持長久,原因雖或複雜,但血統的日趨退化必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法國革命前的貴族都是新貴,中古的貴族都已死淨或墮落。今日英國的貴族能上溯到法國革命時代的已算是老資格的了。至於貴族中的貴族(王族或皇族)因受制度的維護,往往不至短期間就死淨或喪失地位,但血統上各種不健全的現象卻無從避免。百年戰爭時代(十四與十五世紀間)的法國王族血統中已有了深重的神經病苗。今日歐洲各國的王族幾乎沒有一個健全的;只因實權大多不操在王手,所以身體上與神經上的各種缺陷無關緊要。但中國自秦漢以下是皇帝專制的局面,皇帝個人的健全與否對於天下大局有很密切的關係。低能或愚昧的皇帝不只自己可走錯步,他更容易受人包圍利用。中國歷代亂時幾乎都有這種現象。至於血統退化的原因,這是生物學與優生學的問題,本文無需離題多贅。

皇族的退化不只限於血統,在社會方面皇帝與實際的人生日愈隔離,也是一個大的弱點。創業的皇帝無論是否布衣出身,但總都是老經世故明瞭社會情況的領袖,所以不至受人

愚弄。後代的皇帝生長在深宮之中，從生到死往往沒有見過一個平民的面孔，對人民的生活全不了解。例如晉惠帝當天下荒亂，百姓餓死的時候，曾說：“何不食肉糜？”⁽²⁷⁾ 法國革命時巴黎餓民發生麪包恐慌，路易第十六世的美麗王后也曾問過：“他們爲何不吃糕餅？”這樣的一個皇帝，即或身心健全，動機純粹，也難以合理的治理國家，必不免爲人包圍利用；若再加上血統的腐化，就更不必說了。

皇族的退化只是天下大亂的一個次要原因。由中國內部的情形來講，人口的增漲與生活的困難恐怕是主要的原因。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下面另闢一節討論。由外部的情形來講，氣候的變化與游牧民族的內侵是中國朝代更換的主要原因。大地上的氣候似乎是潮濕期與乾燥期輪流當位。潮濕期農產比較豐裕，生活易於維持，世界上各民族間不致有驚人的變動。乾燥期間土著地帶因出產減少，民生日困。並且經過相當長的潮濕期與太平世之後，人口往往已達到飽和狀態，農收豐裕已難維生，氣候若再忽然乾燥，各地就立刻要大鬧饑荒。所以內在的因素已使土著地帶趨向混亂。同時沙漠或半沙漠地帶的游牧民族因氣候驟變，生活更難維持；牛羊大批的餓死，寄生的人類也就隨著成了餓殍。游牧民族在平時已很羨嫉土著地帶的優裕生活，到了非常時期當然要大批的衝入他們心目中的樂國。古今來中國的一部或全部被西北或東北的外族征服，幾乎都在大地氣候的乾燥時期。這絕不是偶然的事。⁽²⁸⁾ 中國被外族征服是二千年來歷史上的一件重大公

(27) 晉書卷四惠帝紀。

(28) 關於氣候變化與游牧民族遷徙的問題，可參考Ellsworth Huntington教授的各種著作，最重要的是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The Pulse of Asia; Character of Races。

案,下面也另節引申討論。

六 人口與治亂

食料的增加有限,人口的增加無窮,這在今日已是常識。一切生物都自然的趨向於無限的繁殖,中國傳統的大家族制度與“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香火主義使人口增加的速度更加提高。一家數十口,靠父祖的遺產坐吃山空,都比賽著娶妻生子。甚至沒有遺產或遺產甚少,但數十口中若有一二人能穀生產,全家就都靠這一二人生活繁殖。所以在小家庭的社會被淘汰的廢人遊民,在中國也都積極的參加人口製造的工作。並且按人類生殖的一般趨勢,人愈無用生殖愈多,低能兒之生兒育女的能力遠超常人,生殖似乎是廢人惟一的用處與長處。所以中國不只人口增加的特別快,並且人口中的不健全份子的比例恐怕也歷代增加。這大概是二千年來中國民族的實力與文化日愈退步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國到底能養多少人口,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人口的統計向來不甚精確。先秦時代可以不論,由漢至明的人口,按官家的統計,最盛時也不過六千萬左右,大亂之後可以減到一二千萬。但這個數目恐怕太低。中國自古以來的人丁稅與徭役制度使人民都不肯實報戶口;若說明以上中國的人口向來沒有達到過七千萬,這是很難置信的。由滿清時代的人口統計,可以看出前代的記載絕不可靠⁽²⁹⁾ 康熙五十年(西元

(29) 漢代人口最盛時五千九百萬‘(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這數目或者還大致可靠。一,因當時的農業方法尚甚幼稚(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二,因今日廣東,廣西,福建,雲南,貴州,

一七一一)的人口爲二千四百萬。五十一年,頒“盛世滋生人丁”的詔書,從此以後人丁賦以康熙五十年爲準,這實際等於廢人丁稅。雍正時代田租與丁賦合併,可說是正式廢除人丁稅。從此戶口實報已無危險,人口的統計不致像前代的虛妄。十年以後,康熙六十年(西元一七二一),增到二千七百萬。此後增加的速率漸漸達到好像不可信的驚人程度。二十八年後,乾隆十四年(西元一七四九),人口忽然加到前古未有的一萬七千七百萬的高度,較前增加了六倍半。二十八年也不過是一世的期間,中國生殖率雖然高,也絕無高到這種程度的道理;顯然是前此許多隱瞞的人口現在都出頭露面了。再過十年,乾隆二十四年(西元一七五九),就有一萬九千四百萬。再過二十四年,乾隆四十八年(西元一七八三),就有二萬八千四百萬,將近三萬萬的人口高潮了。(30) 此時社會不安的現象漸漸抬頭,高宗遜位之後就發生川楚教匪的亂事,可見飯又不殼吃的了。自此以後,至今一百四十年間社會總未安定,大小的亂事不斷的發生。所以就拿中國傳統極低的生活程度爲標

與四川一部的廣大區域方才征服,尙未開發。三,因長江流域一帶也沒有發展到後日的程度。大概漢時承繼古代法治的餘風,政治比較上軌道,人民也比較的肯負責,大致準確的人口統計還不是絕對辦不到的事。至於唐代人口最盛時只有五千萬的記載,絕不可信;此後歷代的統計就更不值一顧了。

(30) 關於歷代人口的統計,除散見於正史地理志或食貨志諸篇外,最方便的參考書就是文獻通考卷一〇至一一戶口考,續文獻通考卷一二至一四戶口考,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九至二〇戶口考。

準，三萬萬的人口是中國土地的生產能力所能養的最高限度。歷代最高六千萬的統計，大概是大打折扣的結果，平均每五人只肯報一人。

至於今日四萬萬以至五萬萬的估計，大致也離實情不遠。這個超過飽和狀態的人口是靠外國糧食維持的。近年來每年六萬萬元的入超中，總有二萬萬元屬於米麥進口。都市中的人幾乎全靠外國糧食喂養，鄉間也有人吃洋飯。這在以農立國的中華是生民未有的變態現象。今日的中國好比一個坐吃山空的大破落戶，可吃的東西早已吃淨，現在專靠賣房賣田以至賣衣冠鞋襪去糊口，將來終有一天產業吃光，全家老小眼看餓死。(31)

歷代人口過剩時的淘汰方法，大概不出三種，就是饑荒，瘟疫，與流寇的屠殺。人口過多，豐收時已只能勉強維持；收成略減，就要大鬧饑荒。饑荒實際有絕對的與相對的兩種。廣大的區域中連年不雨或大雨河決，這是絕對的饑荒，人口不負責任。但中國每逢亂世必有的饑荒不見得完全屬於這一類，最少一部份是人口過剩時收成稍微減少人民就成千累萬的餓死。

瘟疫與饑荒往往有連帶的關係。食料缺乏，大多數人日常的營養不足，與病菌相逢都無抵抗的能力，因而容易演成大

(31) “兵在精，不在多”，誰都承認。一講到人口，一般的見解總以為是多多益善。這是不思的毛病。南京中國地理學會出版的地理學報第二卷第二期‘民國廿四年六月’中有胡煥庸教授中國人口之分布一文，可代表少數人的開明見解，注意中國人口問題的人都當一讀。

規模的傳播性瘟疫。試看歷代正史的本紀中，每逢末世饑荒與瘟疫總是相並而行，這也絕非偶然的事。

饑荒與瘟疫可說是自然的淘汰因素，人爲的因素就是流寇。流寇在二千年來的中國歷史上地位非常重要，甚至可說是一種必需的勢力。民不聊生，流寇四起，全體餓民都起來奪食，因而互相殘殺。赤眉賊，黃巾賊，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是最出名的例。但流寇不見得都是漢人，西晉末的五胡亂華也可看作外族餓民的流寇之禍。

在民亂初起時，受影響的只限於鄉間，但到大崩潰時城市與鄉間一同遭殃。例如西晉永嘉之亂時，

“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惟一旅，公私有車四乘。”⁽³²⁾
長安城中的人民或死亡，或流散。至於鄉間的情形，據永嘉間的并州刺史劉琨的報告：

“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返，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

後來劉琨轉戰到達晉陽（今太原），只見

“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³³⁾

(32) 晉書卷五 愍帝紀。

(33) 俱見 晉書卷六二 劉琨傳。

城鄉人口一併大減。歷史中所謂人民“十不存一二”或者說得過火,但大多數人民都死於刀兵水火或饑餓,是無可懷疑的。

民間歷代都有“劫”的觀念,認為天下大亂是天命降劫收人。這種民間迷信實際含有至理。黃巢的殺人如麻,至今還影射在民族心理的戲劇中。黃巢前生本為目連,因往地獄救母,無意中放出八百萬餓鬼,所以他須托生為收人的劫星,把餓鬼全部收回。凡該被收的人,無論藏在甚麼地方,也逃不了一刀。這就是所謂“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難逃。”這種神祕說法實際代表一個慘痛的至理。那八百萬人(黃巢直接與間接所殺的恐怕還不只此數),無論當初是否餓鬼,但實際恐怕大多數是餓民或候補的餓民,屠殺是一個簡直了當的解決方法。

(34)

歷代人口的增減有一個公式,可稱為大增大減律。增加時就增到飽和點甚至超飽和點,減少時就減到有地無人種有飯無人吃的狀態。人口增多到無辦法時,由上到下都感到生活困難;官吏受了生活恐慌心理的影響,日愈貪污,苛捐雜稅紛至沓來。民間的壯健份子在飢寒與貪污的雙層壓迫下,多棄地為匪,或入城市經營小本工商,或變成無業的流民與乞丐。棄地日多,當初的良田一部成為荒地,生產愈少,饑荒愈多。盜匪徧地之後,凡不願死於饑荒或匪殺的農民,也多放棄田地,或入城市,或為盜匪。荒地愈多,生產愈少;生產愈少,饑荒愈甚;饑荒愈甚,盜匪愈多;盜匪愈多,荒地愈廣。這個惡圈最後一定發展到良民與盜匪無從辨別的階段,這就是流寇的階段。

(34) 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黃巢的八百萬餓鬼中還有不少的洋鬼!見張星烜教授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三冊第二九節。

長期的醞釀之後，人口已經減少；再加最後階段的流寇屠殺，當初“粥少僧多”的情形必一變而成“有飯無人吃”的局面。至此天下當然太平，真龍天子也就當然出現。大亂之後，土地食料供過於求，在相當限度以內人口可再增加而無饑荒的危險。所以歷史上纔有少則數十年多則百年的太平盛世：西漢初期的文景之治，東漢初期的中興之治，唐初的貞觀之治，清代康熙乾隆間的百年太平，都是大屠殺的代價所換來的短期黃金境界。生活安逸，社會上爭奪較少，好弄詞藻的文人就作一套“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理想文章來點綴這種近於夢幻的境界。

但這種局面難以持久。數十年或百年後，人口又過剩，舊的慘劇就須再演一遍。

七 中國與外族

二千年來外族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在原則上，中國盛強就征服四夷，邊境無事；中國衰弱時或氣候驟變時遊牧民族就入侵擾亂，甚或創立朝代。但實際二千年來中國一部或全部大半都在外禍之下呻吟。五胡亂華與南北朝的三百年間，中原是外族的地盤。後來隋唐統一，中國算又自主。但隋與盛唐前後尚不到二百年，安史之亂以後，由肅宗到五代的二百年間，中原又見胡蹄時常出沒，五代大部是外族擾攘的時期。北宋的一百六七十年間，中國又算自主，但國防要地的燕雲始終屬於契丹，同等重要的河西之地又屬西夏。南宋的一百五十年間，北方又成了女真的天下。等到女真已經漢化之後，宋金同歸於盡，一百年間整個的中國是蒙古大帝國的一

部，這是全部中國的初次被征服。明朝是盛唐以後漢族惟一的強大時代，不只中國本部完全統一，並且東北與西北兩方面的外族也都能相當的控制。這種局面勉強維持了約有二百年，明末中國又漸不能自保，最後整個的中國又第二次被外族征服。二百年後，滿人已經完全漢化，海洋上又出現了後來居上的西洋民族。鴉片一戰以後，中國漸漸成爲西洋人的勢力，一直到今天。

中國雖屢次被征服，但始終未曾消滅，因爲遊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於中國，入主中國後就都漢化。只有蒙古人不肯漢化，⁽³⁵⁾所以不到百年就被驅逐。遊牧民族原都尚武，但漢化之後，附帶的也染上漢族的文弱習氣，不能振作，引得新的外族又來內侵。蒙古人雖不肯漢化，但文弱的習氣卻已染上，所以漢人不很費力就把他們趕回沙漠。

鴉片戰爭以下，完全是一個新的局面。新外族是一個高等文化民族，不只不肯漢化，並且要同化中國。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曾遭遇過的緊急關頭，惟一略爲相似的前例就是漢末魏晉的大破裂時代。政治瓦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長期受外族的侵略與統治。舊文化也衰弱僵化，因而引起外來文化勢力的入侵，中國臨時完全被佛教征服，南北朝時代的中國幾乎成了印度中亞文化的附庸。但漢末以下侵入中國的武力與文化是分開的，武力屬於五胡，文化屬於印度。最近一百年來侵入中國的武力與文化屬於同一的西洋民族，並且武力與組織遠勝於五胡，文化也遠較佛教爲積極。兩種強力併於一身而向中國進攻，中國是否能支持，很成問題。並且五

(35)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〇。

胡與佛教入侵時，中國民族的自信力並未喪失，所以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五胡為漢族所同化，佛教為舊文化所吸收。今日民族的自信力已經喪失殆盡，對傳統中國的一切都根本發生懷疑。這在理論上可算為民族自覺的表現，可說是好現象。但實際的影響有非常惡劣的一方面：多數的人心因受過度的打擊都變為麻木不仁，甚至完全死去，神經比較敏捷的人又大多盲目的崇拜外人，捉風捕影，力求時髦，外來的任何主義或理論都有它的學舌的鸚鵡。這樣說來，魏晉南北朝的局面遠不如今日的嚴重，我們若要找可作比較的例證，還須請教別的民族的歷史。

古代的埃及開化後，經過一千餘年的醞釀，在西前一六〇〇年左右全國統一，並向外發展，建設了一個大帝國，正如中國的秦漢時代一樣。這個帝國後來破裂，時興時衰，屢次被野蠻的外族征服，但每次外族總為埃及所同化。這正與中國由晉至清的局面相同。最後於西前五二五年埃及被已經開化的波斯人征服，埃及文化初次感到威脅。但波斯帝國不能持久，二百年後埃及又為猛進的希臘人所征服。從此埃及文化漸漸消滅，亞歷山大利亞後來成為雅典以外最重要的希臘文化城。從此經過羅馬帝國時代，埃及將近千年是希臘文化的一部份。最後在西元六三九至六四三年間，埃及又為回教徒的亞拉伯人所征服，就又很快的亞拉伯化，一直到今天埃及仍是亞拉伯文化的一部份。今日在尼羅河流域只剩有許多金字塔與石像還屬於古埃及文化。宗教以及風俗習慣都已亞拉伯化，古文字也早已被希臘文與亞拉伯文前後消滅，直到十九世紀纔又被西洋人解讀明白，古埃及的光榮歷史纔又被人發

現。

古代的巴比倫與埃及的歷史幾乎同時，步驟也幾乎完全一致，也是在統一與盛強後屢次被野蠻的外族征服，但外族終被同化。後來被波斯征服，就漸漸波斯化，最後被亞拉伯人征服同化。今日在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地已經找不到一個巴比倫人，巴比倫的文字也是到十九世紀纔又被西洋的考古學家解讀明白的。

中國是否也要遭遇古代埃及與巴比倫的命運？我們四千年來的一切是否漸漸都要被人忘記？我們的文字是否也要等一二千年後的異族天才來解讀？但只怕漢文一旦失傳，不是任何的天才所能解讀的！這都是將來的事，難以武斷的肯定或否定。但中國有兩個特點，最後或有救命的效能，使它不致遭遇萬劫不復的悲運。中國的地面廣大，人口衆多，與古埃及巴比倫的一隅之地絕不可同日而語。如此廣大的特殊文化完全消滅，似非易事。但現代戰爭利器的酷烈也為前古所未有，西洋各國宣傳同化的能力也是空前的可怕，今日中國人自信力的薄弱也達到了極點，地大人多似乎不是十分可靠的保障。

另外一個可能的解救中國文化的勢力就是中國的語言文字。漢文與其他語文的系統都不相合，似乎不是西洋任何的語文所能同化的。民族文化創造語言文字，同時語言文字又為民族文化所寄託，兩者有難以分離的關係。語言文字若不失掉，民族必不至全亡，文化也不至消滅。亞拉伯人所同化的古民族中，只有波斯人沒有失去自己的語言文字，所以今日巴比倫人與埃及人已經絕跡於天地間，但波斯地方居住的仍

是波斯人,他們除信回教之外,其他都與亞拉伯人不同。並且他們所信的回教是亞拉伯人所認為異端的派別,這也是波斯人抵抗亞拉伯文化侵略的表現。這種抵抗能力最少一部份是由於語言文字未被同化。西洋文化中國不妨盡量吸收,實際也不得不吸收,只要語言文字不貿然廢棄,將來或者終有消化新養料而復興的一天。